

THE FRONTIER

前沿

VOL.14,
DEC. 2016



PRESENTED BY CFAUMUNA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荣誉出品



以青年之视角，
观世界之前沿

卷首语

1995 年，外交学院第一次将模拟联合国活动引入中国，时至今日，已逾廿年。从无到有，模拟联合国活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开花，平均每天有超过三个会议正在进行。

在这样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模拟联合国活动所关注议题的进一步探索，甚至对模拟联合国本身的研究，成为摆在所有模拟联合国活动组织者、参与者和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也正因如此，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学术部研究出版分支于 2013 年 11 月开始制作《前沿》刊物，精选校内外众多优秀思想者的作品，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年探讨问题，分享观点。

随着新一届编委会的成立，《前沿》将在未来的一年里继续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与评论文章。除原有的理论研究、国别分析、思想探索等栏目外，新一年的《前沿》还将把目光投向模拟联合国的会务领域，邀请资深的活动组织者分享经验。除此之外，日语工作组和西班牙语工作组的成立也将为小语种学习者提供新的平台，更好地顺应学校“爱祖国、知世界、通专业、精外语、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

我们认为，模联人不应当局限于会议的参与者，而更是观察者、思考者、分析者。我们希望，这些粗浅的思考能引发对国际局势和外交理论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让模拟联合国活动更良性地发展。我们相信，青年，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青年之视角，观世界之前沿。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前沿》编辑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THE FRONTIER 前沿

Vol.14, Dec 2016

寄语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秘书长
2017 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秘书长
叶爽
2016 年 12 月

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对柬埔寨当前政治局势的影响

邹学冕 6

普京时代的利益集团格局与对外政策倾向

褚浩然 10

古巴导弹危机中“朱庇特”导弹问题对苏土关系演变的影响

姚佳良 13

The Adverse Impact of Foreign Media's Unobjective Coverage of China

Cheng Lee 16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olitical certainty?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inevitability of Brexit

ZHAO Minshu 19

How to Make a Persuasive Speech Elegantly:

A Case Study of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s Speech at the 2016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LI Na 22

少しでも中日関係の友好を進むために

樊子贤 26

日本における模擬国連活動の現状

孙益民 32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荣誉出品

Honorably Presented by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顾问 Adviser

叶爽 钟源 YE Shuang ZHONG Yuan

主编 Editor-in-chief

秦谦 CEON Him

副主编 Vice editor-in-chief

马博远 MA Boyuan

编辑部主任 Editorial director

任可心 REN Kexin

编辑委员 Editorial Board Member

杜思佳 DU Sijia

多语言工作小组

Multi-language Working Group

英语编辑 English editor

李娜 LI Na

法语编辑 French editor

顾欣 GU Xin

日语编辑 Japanese editor

秦谦 CEON Him

西班牙语编辑 Spanish editor

冯涵宇 FENG Hanyu

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对柬埔寨当前政治局势的影响

邹学冕

【摘要】和平重建后的柬埔寨在过去人民党执政的二十多年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丰硕的经济发展成果能否使人民党平稳度过本轮国内政治危机并在2018年再次赢得大选呢？本文认为，柬埔寨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其落入合法性的“政绩困局”之中，因此柬埔寨目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对人民党不利影响不足以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即如果人民党继续采取现有政治策略，其将可以度过本轮政治危机并赢得2018年的大选。

【关键字】经济发展 合法性 政绩困局
人民党 柬埔寨

引言

随着2018年柬埔寨大选的临近，柬埔寨政治环境自2015年起开始趋于紧张。特别是在反对党，即救国党主席沈良西流亡法国，副主席金速卡被军警围困在党总部后，柬埔寨本轮政治危机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甚至引起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关注。然而在目前对柬埔寨本轮政治危机的研究和媒体评论报道中，大多仅关注于具体政治表态与措施对局势的影响，而忽视了柬埔寨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对政治的根本性影响。

在威权政治环境下经济增长在带来其丰硕的经济成果的同时也会对政治权威带来挑战，本文将从经济增长带来的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入手，对“政绩困局”中的分配问题、社会结构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官僚腐败问题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从而得出柬埔寨没有陷入“政绩困局”，群体性事件在柬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结论。接下来本文将进而以此结合柬埔寨目前国内形势对其他可能影响柬目前政治稳定的因素进行解释性的说明，并最终推导出柬经济发展使救国党没有条件与资本挑战人民党的现有地位的结论，并预测人民党将在平稳度过危机后赢得大选。

* 邹学冕是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学术总监。

合法性的“政绩困局”

政权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因素，根据李普塞特的定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能力¹。也就是说，合法性强调了民众对于现有政治秩序或者统治的认同、忠诚。因此合法性也就代表了民众对于现政权统治的认可，这无疑对政治统治的稳固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柬埔寨人民党在1997年的大选中击败奉辛比克党并在之后的选举中接连获胜，使柬埔寨政坛出现了完全的一党独大局面，也使洪森本人成为了柬埔寨独立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行政领导人。虽然柬埔寨目前拥有民主的选举制度，但一党独大的局面自然地造成了人民党拥有更多的选举资源的现象，也使得其他党派不能在资源平等的条件下与之竞争。加之柬埔寨民主制度的运行本身也因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而屡遭诟病，因此评估人民党执政政权合法性并不能简单地从法理性角度分析，而更应该关注有效性。

有效性，即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在现代世界可以反映在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上。那些能够成功地适应工业系统需要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动荡往往是最少的，他们保持了传统的合法性²。但在承认有效性对合法性的支持的基础上，也有学者提出不能夸大其在合法性建设中的作用。亨廷顿曾指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³那么人民党在柬埔寨的统治有没有落入“政绩困局”之中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先对“政绩困局”的具体体现进行总结，再将其与柬埔寨目前局势进行比较。

1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社会的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P55

2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社会的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P59

3 加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P59

“政绩困局”的具体体现

在亨廷顿所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丁美洲、东亚及非洲的众多国家在短短几年内经历了国家转型的过程。亨廷顿在分析这些国家转型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了“政绩困局”对其的影响。本文选取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只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单纯的增长并不能使人们感觉到分配的公平，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分配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更加广泛，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判断，而分配问题在社会中的直接体现是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因此基尼系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绩困局”的严重程度。

第二，即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公平分配，人们也会因为没有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而转向寻求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就是说，政府绩效存在着一个上限，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水平，它就不能提供合法性了⁴。有学者认为，在开放市场、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繁荣中，其涉及到的契约精神将影响到参与经济活动的民众，致使民众反思权威体制是否会破坏契约精神中公平、公开的本质属性⁵。但这样的市场契约伦理的崛起并不是自动完成的，一来要考虑并不是所有经济发展有赖于市场开放的经济，二来也要考虑到经济参与者或受益者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因此经济发展如果对政治产生影响，至少还要有赖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民受教育程度等等因素。

第三，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形式对“政绩困局”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即政权所创造出来的“政绩”能否经得起经济波动的考验。特别是威权政治下，把政绩作为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时，经济波动对于政权合法性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亨廷顿的分析中他也指出：“随着 1973-1974 年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衰退，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⁶”。这导致了 90% 石油依赖进口的菲律宾经济滑坡加剧。而类似的，在 2010 年国际粮价上涨近 50% 的时候，大

量粮食依赖进口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出现大范围失业、财政危机等状况，这也为后来的阿拉伯之春埋下了祸根。因此基于外债负担、能源粮食对外依赖程度、失业率等因素衡量的抗经济波动能力也是“政绩困局”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四，威权政体的政治精英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前期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他们既是经济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又准确的把握了国际经济的发展态势，及时主导调整了产业结构，迎合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⁷。但政府在经济领域全面而又深入的介入，在其创造“政绩”的同时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甚至到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政策运行，进而导致了政体政治合法性的动摇，其核心表现就是严峻的官僚腐败。

柬埔寨经济发展状况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

在简要分析“政绩困局”的具体体现之后，本文在这一部分将分析柬埔寨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并采取一一对应的形式和“政绩困局”的体现进行对比，进而归纳出柬埔寨与“政绩困局”之间的关系。

柬埔寨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情况

本文调查了经历国家转型的国家在转型前一年的基尼系数及转型前五年的基尼系数平均增幅。结果如下⁸。（表格见下页）

4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85

5 王源：《合法性危机与威权政体的困局——基于韩国政治发展的梳理》，南开大学学报

6 加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P64

7 王源：《合法性危机与威权政体的困局——基于韩国政治发展的梳理》，南开大学学报

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GINI>

| 国家 | 转型前一年基尼系数 | 转型前五年基尼系数增幅 |
|-----|-----------|-------------|
| 韩国 | 44.61 | 11.61 |
| 西班牙 | 37.60 | 4.20 |
| 菲律宾 | 45.70 | 1.00 |
| 阿根廷 | 42.80 | 7.60 |
| 乌拉圭 | 41.52 | -4.48 |

尽管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具体方法上其会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基尼系数本身在衡量贫富差距中也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通过图表仍可以大致看出在国家发生转型前社会贫富差距基本较大，即基尼系数高于普遍认为的 40 正常水平，且基本呈现上升的态势，这就意味着公民在承受着较大的贫富差距的同时不抱有对现政权能够改变这一局面的预期，从而开始质疑当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而柬埔寨的基尼系数则截止到 2013 年已经保持了连续 9 年的连续下降，由 2004 年的 41.9 下降至了 2013 年的 30.8⁹。对比面临国家转型的国家，柬埔寨人民党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本文认为柬埔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原因有三，一是王国政府在落实“四角战略”¹⁰过程中注重其中“平等”这一内涵的落实，出台了一系列改善民生、加强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二是柬埔寨国内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受到王国政府一定程度上的财政支持，使其在柬埔寨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再分配作用；三是大量来自外国的经济援助在柬埔寨得到充分利用，很多直接作用于扶贫项目，使得贫富差距得到了缓解。

尽管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至少人民党政府在维持柬埔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缩小了贫富差距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从一个方面落入“政绩困局”。

经济发展对柬埔寨社会结构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提，市场契约伦理的崛起并不是自动完成的，它有赖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中有强大影响力的中产阶级数量的变化。

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bank.shi.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country=KHM&series>

10 即第二届王国政府所提出的“增长、就业、平等、效率”的执政宗旨

柬埔寨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对柬埔寨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全球经济网站的数据显示，柬埔寨在 2014 年仍然有 79.49% 的农村人口¹¹，这远远高于 1987 年韩国面临国家转型时仅 33% 的农村人口，也高于 1986 年菲律宾 55% 的农村人口¹²。

而柬埔寨目前中学入学率也仅为 49%，这也远低于 1987 年韩国 85% 和菲律宾 66.39% 的中学入学率¹³。同样的对比状况也发生在柬埔寨与西班牙以及拉美国家的对比中。

高比例的农村人口和相对较低的入学率构成了市场契约伦理崛起的障碍。事实证明并没有高比例的人口可以直接从商业领域获利并受商业规则的影响而将近 10% 的贫困人口比例也制约了中产阶级规模的发展。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也进一步阻碍了人民由经济追求向政治追求的过渡。因此柬埔寨目前还没有达到有效性提供合法性中政府绩效的上限，因此也就从第二个方面规避了“政绩困局”的出现。

柬埔寨目前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

随着柬埔寨在 2010 年推出“开放天空”政策，柬埔寨成为了东南亚吸引外商投资的热门国家，大量外资的涌入给了人们关于柬埔寨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印象。环球经济网站的数据显示，2015 年柬埔寨外商直接投资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31%¹⁴，这的确相比于其他国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

11 数据来源：全球经济网站 http://www.theglobaleconomy.com/Cambodia/rural_population_percent/

1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RUR.TOTL.ZS?page=5>

13 数据来源：全球经济网站 http://www.theglobaleconomy.com/Philippines/Secondary_school_enrollment/

14 数据来源：环球经济网站 http://www.theglobaleconomy.com/Cambodia/Foreign_Direct_Investment/

这并不意味着柬埔寨经济的脆弱性。一来，外商的涌入促进了柬埔寨本身经济发展，二来选择进入柬埔寨的外资大多聚集在实体经济，而非“买办”式的掠夺性侵入，这不仅给柬埔寨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帮助柬埔寨发展了工业从而和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转型和转移相对接。而真正把控柬埔寨国计民生命脉的能源和粮食却没有过多的对外依赖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经济的脆弱性可能会体现在产业过于单一。柬埔寨的制衣业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例 2007 年就已经高达 70%¹⁵。这一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将国民经济的增长押注于有限几个优势产业不仅是难以持续的，也是极具风险的。目前柬埔寨的制衣业面对来自中国、越南以及孟加拉国等多个国家的激烈竞争，行业的上升空间有限。在整个制衣业价值链中，柬埔寨主要负责裁剪和缝制环节，而价值链的两端——原材料的生产与最终的消费市场——都不在国内，因此柬埔寨制衣业对整个产业的控制有限，获得的利润有限。但尽管柬埔寨经济的单一性存在着风险，但目前其仍然是柬埔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而从长远来看，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势必将是一个大的趋势，柬埔寨作为转移的承接者也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而从历史的角度看，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问题甚至引发政治动荡之时，柬埔寨经济一枝独秀，连续多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 7% 以上的增长水平。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面对经济危机和去年 TPP 的挑战，柬埔寨国内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0.2% 到 0.4%，这与阿拉伯世界动辄近 50% 的失业率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柬埔寨目前社会的稳定程度。因此目前来看，“政绩困局”的第三个层面也不对人民党的统治合法性构成威胁。

柬埔寨官僚腐败情况评估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公共部门透明度、问责性和腐败评级，所有国家被分为六个等级，等级越高腐败程度越高。柬埔寨在这个评价体系中处于第二等级，和肯尼亚、坦桑尼亚并列而稍好于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

必须承认，柬埔寨现政府在腐败问题上

表现不佳，但本文认为，这仍然不构成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威胁。第一，官僚腐败在客观上并没有阻碍柬埔寨经济的发展甚至没有影响在宏观上促进社会公平，即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说其政绩可以部分弥补其在腐败问题上的弱点。然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柬埔寨还没有形成一支给人面貌一新的政党力量，目前最大的反对党，即救国党也在这几年接连被爆出国会议员收受贿等丑闻，虽然这不排除是人民党的政治策略，但至少在人民心中给救国党留下了阴影，这也使得救国党在人民党的“论战”中很少提及腐败的问题，因此官僚腐败暂时对柬埔寨政治局势也不构成威胁。但从长远来看，腐败问题的确是埋在执政党脚下的定时炸弹，一旦被引爆则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只是目前被引爆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罢了。

“政绩困局”与柬埔寨政治局势

通过之前一个部分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柬埔寨人民党目前没有落入“政绩困局”之中，也因此其统治合法性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即有效性依然还在其合法性建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既然合法性仍然掌握在人民党手中，那么宏观上民众依然认可现行的由人民党占有绝对优势的政治秩序，也因此不会在柬埔寨爆发大规模群体性的反政府事件。这一点从近期发生的“救国党请愿书指纹重复”事件中可以得到印证，即事实上并没有救国党宣称的那么多人民是支持救国党的。

那么除了群体性事件，是否还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式使得柬埔寨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呢？本文给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首先获益的就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员，不仅公务员工资在人民党执政期间得到了大幅的增长，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各部门主要官员均是人民党党员，因此在国家机关内部形成压力集团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军队目前也不可能在柬埔寨政治变迁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军队本身在柬埔寨国家体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每年柬埔寨军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到 1.5%，二是军队本身就是由人民党在推翻红色高棉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洪森也曾在战争期间是这支军队的领袖，因此虽然在王国政府成立后军队进行了国家化，但依然动摇不了人民党对军队的控制，这也可以在

15 IMF, Cambodia, Statistics Appendix, IMF Country report, No. 09/48, 2009.

新政府成立初期人民党与奉辛比克党的交锋中得到印证。

目前柬埔寨政治局势正在日趋紧张，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柬埔寨各大媒体也纷纷对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局势表示担忧，甚至还举行了祈福仪式，以期政治稳定。尽管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但从经济发展与合法性的角度看，救国党目前根本没有资本与人民党进行对抗，人民党将必然地平穩度过本次危机并在下一个任期继续执政。

但必须注意的是，本文的所有论述分析均建立在“当前”的前提下，即人民党当前没有落入“政绩困局”之中，并不表示人民党将来不会落入“政绩困局”之中。虽然本文暂不讨论“政绩困局”发生的必然性，但一个政党如果要想保持生命力就必然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发展轨迹，及时排除隐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将必然被历史所抛弃。

普京时代的利益集团格局与对外政策倾向

褚浩然

【摘要】 本文遵循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着重考察了普京时代俄罗斯利益格局的调整，分析了这一调整与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向的关联性，阐述了普京执政以后各利益集团的此消彼长、人员组成、利益关切和思维方式，指出了利益集团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得出了初步的结论，提出了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字】 俄罗斯外交 利益集团 普京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不是孤立的，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深受其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与制约，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也不例外。罗伯特·帕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同时在两个棋盘上进行政治博弈，即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故而这位兼顾两盘棋局的战略棋手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国际关系的各个要素，还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比如公共舆论、政治选举、利益集团、政治体制等等。普京便是这样一位战略棋手，自2000年以来，普京已经担任了三届总统、一届总理，事实上，他一直居于俄罗斯统治集团的核心。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他也会受到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其中，俄罗斯的利益集团是一股影响外交政策的强大力量。本文则着重研究普京时

代¹俄罗斯利益集团与俄罗斯外交政策倾向之间的关联性。

一、利益集团格局的制度背景：“总统集权制”

在考察利益集团格局与外交政策倾向关联性之前，需要对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殊性进行说明，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俄罗斯利益集团格局的变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始仿照西方建立民主制度。但是，究竟是实行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各派力量对此争执不下。在议会中占优势的俄共力量与叶利钦集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以至于在1993年出现了“炮打白宫”的流血事件，叶利钦用武力击败了以哈布斯拉托夫和鲁茨科伊为首的议会反对派。随后通过的新宪法在俄罗斯确立了总统制，国家杜马和联邦议会的权力受到限制，总统的强势地位凸显，国家杜马的法律需要总统签署才能生效，总统可以解散国家杜马，而议会弹劾总统却需要一系列繁杂而苛刻的程序。由此可见，1993年的宪法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政体不是一般的总

¹ 本文所指的普京时代，是指2000年至今的历史时期，在这期间普京担任过总统（2000年至2008年，2012年至今）和总理（2008年至2012年）。在这16年的时间里，普京始终是俄罗斯统治集团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最高决策者。尽管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梅德韦杰夫担任了俄罗斯总统，但是梅德韦杰夫背景简单，没有自己的团队，本身又出自普京班底，绝大多数重要职位仍然是由普京的亲信担任，所以本文依然视这四年为普京时代。

* 褚浩然是外交学院外语系法语专业四年级的学生，也是外交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会创始人。

统制，而是“总统集权制”，一些政治活动家甚至声称 1993 年宪法是“专制制度的宪法”，“使专制制度合法化”。

分析完俄罗斯的制度设计，我们不妨再考察一下俄罗斯的政党格局。自 2003 年开始，统一俄罗斯党就一直成为杜马的第一大党，而这一政党向来是亲总统的“政权党”。这就进一步弱化了议会的监督与制约的力量，行政权力可以很大程度上不受议会的束缚，因为议会的多数党与行政权同属于一派政治力量。

普京上台以来，又采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措施，构建垂直权力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控制，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到总统身上。“政府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已经被最小化了。通过剥夺议会、内阁以及地方长官的大部分权力，普京总统几乎将这些正式组织机构削弱的没有实质性内容了。”²因此，俄罗斯总统的权势相当之大，把俄罗斯的政体说成是总统集权制，也是有根据的。

由于总统的权力十分之大，对国家的政治生活起着主导作用，因为各种利益集团也争相与总统建立联系，通过资助选举、制造舆论、提供建议来影响总统的政策，甚至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进入国家政权担任要职，成为总统的“身边人”。因此，利益集团与外交政策倾向之间的关联性，便是在总统集权制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二、普京时代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洗牌”与外交政策的转向

俄罗斯存在着足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利益集团，这是学界的共识。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的利益集团遭到“洗牌”，其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而这些调整甚至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倾向。利益集团格局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叶利钦时代的经济寡头被普京时代的“强力集团”与“圣彼得堡帮”所取代，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叶利钦时代亲西方的外交倾向被普京时代的“全方位外交”所取代。

20 世纪末期，由于苏联解体和经济改革的混乱，一批曾前苏联的党政精英利用自身的特权与社会关系，在私有化改革中把大量

国有资产攫为己有，主要方式是在黑市低价收购俄罗斯居民持有的私有化债券，以及在后来叶利钦政府的“债转股”计划中低价获得优质国有资产。这批党政精英一跃成为控制国计民生的经济寡头，持有富可敌国的垄断资本，构建了一系列“金融 - 工业帝国”，甚至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1996 年大选前，俄罗斯主要的金融寡头在达沃斯论坛会议期间达成协议，联手支持叶利钦。而在叶利钦当选后，对寡头们的支持投桃报李，波塔宁进入内阁成为副总理，而别列佐夫斯基则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资本与权力实现了高度结合。这些经济寡头集团崇信西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又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这一集团构成了亲西方的基本盘，可以说，叶利钦初期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受到了这一利益集团的影响。

普京上台执政后，开始打压原来的经济寡头，曾经左右政坛的“金融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人被迫流亡海外，霍多尔科夫斯基身陷囹圄，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寡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普京也在培植自己的班底，形成了亲普京的利益集团。其中一批被称作“强力集团”，其成员主要是普京在克格勃的同事，如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伊万诺夫、谢钦、帕特鲁舍夫，这些人曾担任或现担任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等要职。“强力集团”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普京的支持，开始在经济上打压竞争对手，并且扩张自身的经济实力，例如 2003 年，时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的谢钦利用国家机器打垮了俄罗斯最大的私有石油公司“尤科斯”并将其总裁投入监狱。³

为了平衡和制约“强力寡头”的影响，普京起用了一批来自圣彼得堡的老乡、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的校友或者昔日在索布恰克手下共同工作过的同事，这些人被称为“圣彼得堡帮”。与“强力集团”比较起来，这一利益集团的组织比较松散，自由主义气息浓厚，梅德韦杰夫是这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其成员库德林也曾担任过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要职。普京通过不同背景的人员掌握核心权力，形成了两大利益集团相互制衡的局面，而普京则处于两地利益集团之上，充当着仲裁人的角色。

2 吕超：《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根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0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3 参见《学习时报》：《“尤科斯事件”的背后》<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s/542918.htm>

由于这两大利益集团都与普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这两大集团对国民经济都有重要的影响，因而有学者把这一情况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

随着经济寡头的没落与“强力集团”、“圣彼得堡帮”的兴起，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倾向也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俄罗斯独立之初的“亲西方外交”基本上由“西方派”为主导的政治观点利益集团主导的话，那么向“全方位外交”的转变背后都渗透着新的经济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利益集团与俄罗斯外交政策显示出极大的关联性。

三、“强力集团”与“圣彼得堡帮”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倾向的影响

“强力集团”成员多来自前苏联的情报和安全系统，这些部门自苏联时代起就是反美主义的大本营。2001年11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前发言人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俄罗斯）整个情报机构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和西方的仇恨基础之上的”。美国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米歇尔·麦克福尔在2001年10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也说：“（俄罗斯）安全部门并不欢迎（普京与西方）建立的联盟，他们不想为西方火中取栗”。⁴强力集团的成员成长于苏联时代后期，他们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上都敌视美国。

另外，“强力集团”借助普京的权势打击了亲西方的经济寡头，获取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强力集团是俄罗斯国内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言人，他们不希望西方的公司进入俄罗斯国内市场参与竞争。因而他们当中很多人持有“俄罗斯的利益天生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益相对立”的观点。

从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之后，“强力集团”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按照霍布森的理论，国家强力集团具有自私的帝国扩张动机，更容易在对外政策上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俄罗斯对外政策在强力集团的影响下更多的采用强硬路线则印证了这一理论观点。譬如，俄罗斯对美国在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和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

自俄军方，“强力集团”认为北约的东扩是美国领导的一个敌视俄罗斯的联盟对俄罗斯的进逼。因此，从2000年以来的情况来看，强力集团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倾向所施加的影响，基本面是反对欧美霸权、进行全方位外交，他们主张实施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

“圣彼得堡帮”也是“总统的身边人”，是一个与克林姆林宫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与“强力寡头”相比，“圣彼得堡帮”并非出身于情报与安全系统等“强力部门”，而是受法律专业的教育或者成长于文官系统，故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与“强力集团”有所不同。英国广播公司（BBC）莫斯科分社主任艾（Konstantin Eggert）就认为：“‘强力寡头’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者的思考，如果你不能展现你比别人强，就不觉得自己有力量，问题是除了能源，俄罗斯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可提供的。而‘圣彼得堡帮’更为理想主义，这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有关，他们更愿意在诸多问题上采取与西方合作的态度，他们希望改善生活远胜于主宰别人，帝国已逝，不再复返，他们知道这一点，也希望俄国将慢慢转型成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⁵因此，圣彼得堡帮对俄国对外政策所施加的影响基本是主张与西方合作，实施较为温和的对外政策。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各个经济部门或公司集团也试图或也在影响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而这些经济部门或者公司集团与“强力集团”、“圣彼得堡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很多公司集团或经济部门被“强力集团”或“圣彼得堡帮”的成员所控制，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或部门有着自身特殊的利益。对于俄罗斯的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林业和木材加工业而言，加入WTO可以避免西方的贸易壁垒，这无疑也是符合他们各自的部门利益的。故而这些部门希望与西方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为例，它在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中发挥巨大作用。如在2001年副外长维克托柳兹尼从一直支持伊朗的共同司法管辖权的立场转变为接近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坚持的把整个海底纳入国家领土区域的立场，其立场转变之快令人惊讶。虽然这种转变可能并不是最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但是和俄气公司的立场完全一致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在俄罗斯对

4 吕超：《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根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5 <http://www.stnn.ee/euro-asia/200804/t20080407-758486.html>

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十分引人注目，足见能源巨头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影响，而俄罗斯的很多能源巨头，同时也是“强力集团”或“圣彼得堡帮”的成员，这就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结论

我们通过研究普京时代俄罗斯的两大利益集团——强力集团和圣彼得堡帮——的人员组成、利益诉求和思维方式，考察了利益集团格局调整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影响：随着亲西方的旧寡头的没落和亲普京的利益集团的崛起，俄罗斯对外政策倾向也从原来的重视西方转变为全方位外交，俄美对抗的因素在逐渐增加。同时，我们还发现“强力集团”和“圣彼得堡帮”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前者更加强硬地反美，而后者则更加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注重与西方保持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一些经济部门，例如能源部门，也会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倾向施加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地表现为避免与西方的摩擦、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而这些经济部门与“强力集团”、“圣彼得堡帮”

之间具体的互动以及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本文没有能力进行考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吕超：《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根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0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陶林：《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

胡键：《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演变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04 年第 3 期。

冯玉军：《俄罗斯利益集团与外交决策》，《现代国际关系》，2001 年 12 期。

陶林：《十年来国内关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09 年 4 期。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古巴导弹危机中“朱庇特”导弹问题对苏土关系演变的影响

姚佳良

苏土关系（后演变为今天的俄土关系），是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中美洲爆发的最重大的一次地缘政治危机。而这两个分属不同地理区域的国际关系议题，却因“朱庇特”导弹问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被提出而被联系到了一起。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实践中，“朱庇特”议题的提出使美苏获得了通过利益交换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可能，而同时，这一议题的提出却使在早先陷入低谷的苏土关系迎来了转机。本文将从介绍“朱庇特”导弹问题入手，阐述古巴导弹危机在苏土关系演变进程中的作用。

导弹危机前的土耳其“朱庇特”导弹问题

“朱庇特”导弹，射程 2980 千米，可携带 145 万吨 TNT 当量的 W—49 型热核战斗部（即氢弹弹头），是美国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完成研发的可投入实战的可搭载核武器的中程弹道导弹之一。“朱庇特”导弹在 1957 年正式被纳入北约战略规划后，经过北约成员国的内部协商，最终被决定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对于美国而言，此次部署只是对达成“遏制苏联战略扩张”这一战略目标的实践。这也意味着，一旦出现了性价比比较“朱庇特”导弹更优的替代产品，“朱庇特”导弹便存在着被替换的可能。

事实上，相比于潜射导弹，该型导弹本身也的确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首先，作为

* 姚佳良是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二年级的学生，也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学术部的总监助理。

井式陆基导弹，其战场生存能力较差，发射井极易在首轮打击中被敌方导弹或空中火力摧毁；其次，该型导弹对于部署国操作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第三，该型导弹作为液体燃料导弹，其维护成本要大于固体燃料导弹；第四，该型导弹在测试过程中的表现平平，其性能曾多次引发外界争议。

“朱庇特”导弹的以上技术局限一直为美国决策层所关注。同时，该型导弹在部署土耳其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若干次由土方维护人员引发的安全事故，使美国军方怀疑土耳其是否有能力维护该导弹。因此，军方在部署导弹的同时，也一直在试图寻找“朱庇特”导弹的替代性方案。

而对土耳其方面而言，基于历史上传统的不安全感、斯大林时期土苏关系的交恶以及现实中苏联的威胁，曼德列斯政府在军事防务问题上继续奉行亲西方政策，并认为只要美国承诺对土耳其安全的保护并愿意提供援助，就没有理由怀疑土耳其对美国的依赖。因此，曼德列斯政府在导弹尚处在理论论证期的1957年，就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出了希望将导弹安置于本国的强烈意愿。¹ 尽管在1957年底的北约内部协商中，土耳其了解到了其他北约国家的反对在本国部署导弹的意见及理由，但土耳其仍然坚持本国的选择。美土双方于1959年1月签订了部署导弹的意向书，进而在1959年10月签订导弹部署协议。协议规定1961年11月首个导弹中队将投入运转，全部部署工作将在1962年5月完成。

随着1960年“北极星”潜射导弹具备列装部队的的能力，“朱庇特”导弹在打击苏联这一目的上的战略价值大大降低，因此美国开始计划撤出这批导弹。为达成此目的，美国国务卿于1961年4月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用“北极星”代替“朱庇特”具体实施方案的报告，提出用相等财政预算规模的常规军事援助项目换取“朱庇特”导弹项目撤出土耳其。1961年，腊克斯等多名美国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就此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交涉，但均无果而终。在维也纳会议期间，肯尼迪也曾试图将撤离土耳其导弹问题作为一个议题纳入到和苏联的裁军谈判中²。但由于苏联在柏林问题，老挝和刚

果问题上态度强硬拒绝让步，肯尼迪只得放弃了这次通过美苏共识促成土耳其导弹撤离的机会。6月22日，肯尼迪做出了不会撤出土耳其导弹的决定，使土耳其导弹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二战后苏土关系的发展

由于土耳其在二战期间曾多次打破1936年对苏联做出的承诺，允许轴心国舰艇通过土耳其海峡，而且在苏德战争期间煽动苏联境内穆斯林反对苏联，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土耳其提出了归还争议领土，共管土耳其海峡等要求。苏联提出的这些强硬且具有攻击性的政治诉求，伴随着苏联利用伊朗危机创造出的对土耳其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近300年的战争记忆以及内阁领导人亲西方的个人倾向，使1950年当选的土耳其曼德列斯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坚定的亲美反苏立场。随之，土耳其宣布派兵参与朝鲜战争，于1952年加入北约，并积极配合美国在中东参与建立中东司令部。由于曼德列斯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全面联美抗苏的政策，苏土两国的外交关系与经贸关系在这一时期均降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赫鲁晓夫的上台后，苏联基于配合国内经济改革的需要，提出了旨在缓和外部紧张环境的外交战略。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赫鲁晓夫放弃了斯大林时期提出的多项对土耳其的外交诉求，并利用多种场合试图缓和苏土关系。但由于土耳其和苏联在阿拉伯地区仍存在利益冲突，且土耳其方面认为苏联的缓和只是权宜之计，土耳其对苏联的示好并未作出积极回应。

而进入1958年，曼德列斯政府面临的国际国内压力不断增大。一方面，随着土耳其国内经济疲软，里拉贬值压力巨大，急需通过增大出口的方式缓解汇率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在政治上兴起新一轮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其鲜明的反美反西方化特点使一贯持亲西方政策的曼德列斯政府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在两者的作用下，曼德列斯不得不缓和对苏关系，并于1960年7月访问苏联。这为苏土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然而，发展对苏关系的外交战略还未实现，曼德列斯政府就被军事政变推翻。由于新上台的军政府一方面存在亲西方人士，另

1 FRUS,1958-1960 Volume X Document 305

2 Philip Nash, The Other Missiles of October: 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Jupiters, 1957-1963 P98

一方面又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不利处境，赫鲁晓夫决定在外交上继续与先前政府的缓和政策，并通过将恶化两国关系的责任归咎于曼德列斯政府等舆论宣传手段改善土耳其对苏联的印象。1961年7月2日，土耳其新任国务部长在新政府的政治纲领中宣布将在互相尊重和睦邻亲善的基础上促进苏土关系改善。苏土两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可能。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朱庇特”因素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在致肯尼迪的信中提出用美国取消封锁、保证不侵略古巴和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这三个条件进行交换，换取苏联撤出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肯尼迪虽然在回信中坚持把苏联立即从古巴撤除导弹作为一切和谈的先决条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提议，但同时于1962年10月17日委派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提出将在4到5个月内撤出土耳其导弹，但由于要履行必须的手续，因此不便公开消息³。

在与苏联达成默契后，美方从24日起通过多种渠道探知土耳其方面的态度并向土耳其提出补偿方案。在10月30日的国家安全会议上，美国正式明确表示：“不该继续在土耳其部署落伍的装备，撤出它们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为了换取苏联撤出古巴的战略性武器，美国和西方国家愿意付出相应代价。”⁴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由于美方在朱庇特问题上对苏联的让步，才促成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但也是因为这一让步，“朱庇特”导弹撤离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影响美土关系的焦点问题。

古巴导弹危机后“朱庇特”对苏土关系走向的影响

在导弹危机爆发后，土耳其政府率先宣布支持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政策，并与自己的西方盟国在态度和行动上保持一致。虽然对美苏幕后交易的传言也保持了一定的关注，但土耳其方面由于充分信任美国盟友，又在6月底获得了肯尼迪的保证，便将这一传言视为苏联单方面提出的，意图将问题复杂化的拖延战术。

直到10月25日，土耳其方面才在北约理事会的紧急会议上获得美方的告知。由于导弹撤离问题的提出在事前未知会土方，且土耳其政府与国民均将其视为“关乎本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土耳其方面对于撤离导弹的消息表达了极度的不满和抵触。经过土耳其方面近乎顽固的反对，美国决定向土耳其援助一批包括土方急需的F-104G战斗轰炸机在内的常规武器装备，并提出用北约框架下的以“北极星”导弹为核心的“多边核力量”方案替代原有的“朱庇特”导弹，土耳其方面才默许了“朱庇特”导弹的撤离。

由于丧失了身为陆基导弹部署国的特殊地位，“朱庇特”导弹的撤离无疑意味着土耳其在北约中地位的下降。这间接导致了土耳其国内“退出北约”运动的高涨。“朱庇特”导弹的撤离也引发了60年代土耳其社会对于国家外交战略问题的大讨论。部分土耳其民众开始认为，“美国仅仅是把土耳其看作一个可以随时牺牲掉其国家利益的附属国，土耳其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颗棋子。”⁵一部分激进的民众还指责土耳其政府成为了美国的傀儡。

在北约内地位的下降、社会舆论的压力、伴随着美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分歧的不断加大与“约翰逊信笺事件”的出现，迫使土耳其政府正式开始对以往的外交政策进行反思。

土耳其政府意识到传统的片面依靠西方阵营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被盟友抛弃的风险，而且也很容易被卷入一场违背本国意愿的战争中。因此，土耳其政府开始着手对本国原有外交战略进行调整，试图对苏联开展进一步接触。

而另一方面，“朱庇特”导弹的拆除无疑缓解了苏联在西南方向的安全压力，扫除了苏联与土耳其进一步缓和关系的关键障碍。1963年，土耳其与苏联开展了新一轮互访。通过两国的新一轮互访，土耳其放宽了苏联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的限制，而苏联则主动向土耳其提供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与土耳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援助协定。此后，两国贸易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苏土关系在缓和的基础上第一次实现了发展。

3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多勃雷宁与罗伯特·肯尼迪会谈记录，1962.10.17

4 FRUS,1961-1963 Volume XVI Document 382.

5 肖宪、伍庆玲、吴磊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第118页

The Adverse Impact of Foreign Media's Unobjective Coverage of China

以乌坎村事件为例分析外国媒体对中国扭曲性报道负面影响

Cheng Lee

The first foreign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can trace back to 13th century when an Italian, named Marco Polo, wrot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Yuan Dynasty of China. Since then, foreign missionaries, diplomats, travellers,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have all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the images of China. However, not until the 20th century could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 to the extent of fairly depicting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 policy in 1970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and rise of the Asian power.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as attracted and the foreign media coverag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creased in an unprecedented pace. Some of this coverage, and quite often with a sense of curiosity, provided in-depth information that elevated several issues in China to a broader atten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larger worl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some foreign coverage that inclines to over-exaggeration and even intentional fabrication. And such behaviors will cause several setbacks, including the distrust from the Chinese central leadership, blockage and even attacks on the foreign journalists. The Wukan incident is one of the cases that manifest this claim.

First, in the matter of scrutiny, the term "foreign media" has to be clarified. Therefore, in this essay, "foreign media" refers to not only the western media that include the media in U.S. and the media in U.K. and so on (predominantly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but also the Hong Kong media. Although the Hong Kong media are

sometimes considered as Chinese media, still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land media and are similar to western media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freer political environment.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ideolog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y still share some commonality when reporting incidents that happened in China, especially when reporting the Wukan incident, where exaggeration and fabrication occurred (still, there are some minor differences).

The Wukan (Wukan is a vill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protest started as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11 when officials sold land to real estate developers without properly compensating the villagers. Led by Lin Zulian, the outrageous villagers organized street marching, petitions to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tests in front of several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police stations. The protest escalated in December 2011 when the police organized a siege of the town and captured several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named Xue Jinbo, suspiciously died in Police custody. However, some of the HK media at that time distorted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o be a pro-democracy one. For instance, the Apple Daily once wrote "Wukan Democratic Uprising" in the headline of an article related to the protests and explicitly compared the Wukan protest to the June 4 movement, a movement that centered on pro-democracy. Moreover, The Ming Pao directly labeled Lin Zulian, the protest leader, as the "choice of people" and subsequently claimed that "the villagers are ready to die for democracy" (Bandurski). The general trend at that time in HK media was framing the Wukan protest as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but it was merely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fact, "the

* Chang Lee,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ufts University.

Wukan protesters made appeals within the boundaries that were established formally, but not informally, by the state" (Hua, Hou, and Deng). In other words, the protesters only protested about the corruptions but not about anything related to democracy or anything that contradicted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authority. Although, later, the villagers did employ the democracy rhetoric in order to attract attentions from the central leadership, they soon abandoned it because they feared that the protests would be suppressed as west-supported anti-government forces (Hua, Hou, and Deng). However, surprisingly, the other western media remained quite neutral and factual about the Wukan protest. They reported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s what it supposed to be and seldom employed the democracy rhetoric. Still, they sharply changed their tones when the election started later.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the local communist leaders above agreed to expel the village officials who sold the villagers' lands. Thus, this created an opening of the positions in village officials. Therefore, in accordance to the constitution, villagers then organized a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Villagers gathered in front of a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each cast their vote for the candidates in 2012. However, the foreign media again intervened and over-exaggerated the Wukan election as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and revolutionary. For instance, in a news report of Reuters written during the election, the reporter explicitly framed the villagers as "a front line of democratic activism" and exaggerated the electoral process as "liberal and at times groundbreaking" (Pomfret). Immediately after this was published, The Guardian also added exceptionality to the election by saying that "Wukan is conducting what seems to be one of the China's most free polls" because the election is free of manipulation from the local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Wukan Holds Its Election after Protests That Cowed Officialdom"). Moreover, the Los Angeles

Times then suggested an even bolder point by linking the election to something of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 to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uch election "was closely watched for clues of possible liberaliz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mick). Other foreign media, such 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subsequently quoted several fervent Chinese microbloggers who framed the election as "a model" and "the start of something new" (Chin). As these exaggerations went on, almost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Chinese mainlanders, soon started to label the election as un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with little exception, all started to celebrate this election and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such election was a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progress of China.

However, only a few noticed that the Wukan election was not something new and revolutionary. Yang Hua, a microblogger from Shandong, represents such voice of caution and writes, "This is an election supported by detailed regulation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not new and it doesn't count as reform"(Chin). That is, the direct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mandatory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rganic Law of Villager Committe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98 and the Wukan election was merely one of the many direct elections in 2012. Similarly, Dang Guoying, a Chinese columnist argues, "the election was merely an ascertainment of the current Organic Law of Villager Committe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not counted as a 'revolution' and it did not have further implication" (Dang). In other words, the Wukan election was not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and it certainly did not imply any cutting-edge democratic progress.

Nonetheless, most of the foreign media might focus on the point that the election was exceptional because it was free of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manipulation. In other words, they unanimously believed that the central leadership of China intervened in most of past village elections and arbitrarily selected village leader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villagers' choices. However, such concern stemmed from the western stereotypical view of China. They assumed that most of the past village elections were rigged and manipulated based on their observation in the general party elections and the Hong Kong elections and their constant exposures to the narrow information that framed China as a top-down authoritarian state. In fact, manipulation from the top was hardly a problem. The Carter Center, a U.S.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ssistance and advice to Chinese election officials in standardizing village election procedures and fostering better governance since 1997, provides cruci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ast village elections in its latest report. It praises the efforts pushed forth by the Central Communist Party in punishing bribery. Moreover, the report confirms that the past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is the "institution through which candidates can openly compete and electors can experience true electoral choice". Although the report also identifies three main problems of current village elections: vote buying, the lack of young voters and disallowance of villager autonomy in managing public goods, still manipulation is never mentioned (The Carter Center). Therefore, manipulation is hardly a problem for village elections. Or at least, it is not identified as a major obstacle. And the Carter Center explicitly acknowledges the past village elections as democratic and transparent. As such, the Wukan election was mere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good tradition but not a groundbreaking incident. The foreign media were generally exagger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Wukan election based on shallow observation and ungrounded inference and they simply ignored the successful 14-year practice of direct election.

After 4 years of relatively peaceful

period, Wukan village was again pushed back to unrest when the elected village secretary Lin Zulian was captured and sentenced to 3-year imprisonment under the charge of bribery in September (the validity of the charge remained contested). The villagers again protested and demanded the release of Lin Zulian, claiming that the charges were invalid. The foreign media again caught this opportunity to twist the Wukan incident. In an article of *The Diplomat*, the author firstly introduced the Wukan election as "Wukan democratic election, a groundbreaking event in China that made global headlines". And more intentionally, the article was even titled "China's Wukan Democracy Experiment Comes to a Violent End", explicitly accusing China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 and curtailing the only democracy it had (Wong). Some journalists even posted fak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ath of an 83-year-old woman and used several old photos of Wukan protests in 2011 to frame the intensity of the current protests.

As these exaggeration intensified, the Central Communist Party eventually responded. *Global Times*, a state-sponsored newspaper interviewed the 83-year-old lady and confirmed that she was apparently alive and only had a few injuries. Then it went on to say that "some foreign media have been unscrupulously inciting, planning and directing chaos" ("Foreign Media Fails to Trick Wukan Villagers on Rumor"). That is, the central leadership even started to accuse foreign media of intentionally inciting the local citizens with radical thoughts and creating chaos. Although these claims were not supported by solid evidence, still the resentment towards the foreign media existed in the central leadership and several state-sponsored media. In addi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so organized a complete lockdown of the village, denying any access to the foreign media. Several Hong Kong journalists were even arrested for stealing when they secretly sneaked in to the village to conduct interviews. Moreover, the local police enforcement even rewarded

the villagers for reporting the foreign media to local authority.

Nonetheless, some might argue that the Wukan incident "revealed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or aggrieved citizens in making international appeals...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more indirectly with Chinese netizens to circumvent blockage within the domestic arena, citizens can bring greater pressure to bear on higher-ranking officials. In this case, the citizens of Wukan were able to place pressure on provincial officials to take long-standing local injustices seriously" (Hess). That is, the foreign media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attracting attention to the Wukan incident. As such, the local authority, under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d to compromise to the villagers. However, such conclusion failed to foresee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Wukan incident. As the exaggeration and fabrication intensifi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uld no longer

tolerate such behaviors, therefore, initiated a series of responses. Instead of attracting global attention and pressur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the foreign media eventually irritated it. And what's worse is that, the exaggeration and fabrication triggered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 Wukan protests. Fearing that the democracy rhetoric might spread and cause a snowball effe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suppress the protests, putting an abrupt end to the successful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However, I am not unconditionally denying that the foreign media comes no aid in the course of 4 decades. But, rather, the foreign media, driven by shallow understanding and incorrect inference, sometimes tend to exaggerate an incident or to fabricate false information. And such behaviors, though can put pressure on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ometimes over-pressure it and cause a series of setbacks.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olitical certainty?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inevitability of Brexit

脱欧之悲，孰之过？

ZHAO Minshu

1) Introduction

24th June 2016 is doomed to be a milestone of the United Kingdom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result of the referendum on exiting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was announced on the morning of June 24th that 51.9% citizens voted in support of leaving the European Union while 48.1% chose to remain a member of it. Soon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declared to leave the office at 10 Downing Street owing to the aftermath of political games. Theresa May who had promised to enact strict regulations on refuge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decline the petitions for rescheduling the referendum on exiting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took the place of Mr. Cameron half a month later.

Out of patriotism, the British people gave the event a nickname: Brexit, which is a portmanteau of "Britain" and "Exit". The accomplishment of Brexit brought about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they would get rid of the plague of widesprea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inside the European Union. Meanwhile,

* ZHAO Minshu, Freshman,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member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Model United Nations.

someone who advocated maintaining the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criticized Mr. Cameron for his overestimated confidence in the British on the vital political issue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severe situation would have been reversed as long as Mr. Cameron hadn't utilized it as propaganda pitch for electoral purposes. More ironically speaking, the political radicals and critics even compared him to Mr. Gorbachev who had been notorious for leading to the unprecedented catastrophic sepa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However, these arbitrary assumptions are rather brutal for Mr. Camer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was the leader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al power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parliamentary systems. Dated back to historical backgrounds, we could probe into basic fundamentals and underlying facts contributing to the political certain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deliver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Brexit through exemplify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analyz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uses which aim at presenting an overview on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support the main point by explicit lines of reasoning.

II) Argumentation

2.1 British Visions

It'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s always been stakes in each other's success (for instance the Common Market, the total volume of exportation, etc.). In 1946,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proposed cementing the strategic alliances among European countries by establishing committees and hosting summit conferences. Consequently, with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political aspirations for a joint Europe were put on the agenda. Nevertheless, the British people, composed of royal members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or commoners and civilians,

were unwilling to accept the sub-integrated European Community and respectively diminish thei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a super empire.

Apart from geographical isolation from Eurasia, the political aspects should not be roughly ignored.

Different classes of British society had been abiding by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of splendid isolation for a long span of time. The general consensus on foreign affairs was implicitly reached especially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conducting affairs independently and a deeply-rooted sense of dignity rendered them less cooperative with some newly-emerging countries. As a vivid depiction of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Britain has had the same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 for at least the last 500 years" which is cited from the sarcastic comedy series "Yes, Minister", Britain preferred to stand aside rather than solidify its position through fusing into the hodgepodge. In 1970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determined to integrate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while shelving the remaining historical problems. The consolidation came to a climax when the United Kingdom managed to make a third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Nonetheless, veteran politicians persisted in wielding the decisive power over joining the Euro zone afterwards. They resolutely reserved the right over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and refused to accept the uniform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form in the Euro zone. So it was naturally elucidated that the intricate relations almost went bankrupt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in 2008 an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n 2009. When Western Europe was in chaos and casted off financial deficits, the United Kingdom could resort to its own independent financial policy and release economic vitality by increasing budgets and official bonds. Henc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ould be likely to fold its arms and look on the moaning and groaning about the crisis.

Freezing in the track of interaction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gradually misled each other and lost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ons.

2.2 European Visions

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iom puts, one could be able to clap hands only when the two palms resonated with each other. Except for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its extern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ropean Union itself should also be burdened with the grievous influences upon Brexit. Here we will prioritize some major defects from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

Before we commence to enumerate the questions, we should emphasize regula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As the agreement was reached, the compromise lied with it. According to the Legisl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 set that its sovereign members could exercise ultimate power once yield partial rights to the Assembly. The incongruous administration within different levels was awfully performed and practiced in economic epidemics because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couldn't justify the effectiveness to combat with vital problems. This is best demonstrated in the Euro zone. As the pace of adapting unified currencies was accelerating,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policie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resulted in discrepancies with standardized economic managements from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refore it couldn't streamline the process of strategic resolutions against economic crisis, which might prolong the timely actions towards eliminating obstacles.

Accordingly, the dilemma also resides in making incompatible headway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Regardless of intervening years in the found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in both fields could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as well. Moreover, the circumstances jeopardized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The abuse of welfare, which was the chief criminal of corruption and evasion to the payment of revenue, descended the availability of cooperation among classes of the society. People were skeptical about the functions of the welfare system and inclined to minimize the initiatives in uplifting the working efficiencies which drove the counteractive effects against economic enhancement.

Additionally, the eastern expan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ould be pondered over because it truly produces some shortcomings in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developed powers from the Western Europe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their eastern counterparts. The settlements would fail in attaining the targets if it decreased the average economic standards of the member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summarize, those underlying downsides are distinctly existed in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have faced skepticisms and criticisms from the public. Taking a glimpse of different visions, it is not sophisticated for us to figure ou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assertiveness in Brexit. Frankly speaking, the juvenility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ould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olitical game.

III) Conclusion

Before the Brexit, rumors scattered around the society which predicted that the referendum would be a victory for independ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owever, after the Brexit, slanders attacked 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neering at Mr. Cameron and his country for their conceit and ridiculousness. The final touches of the referendum for Brexit have been settled. And resigning from the parliament, Mr. Cameron was set free from the raging storm where was overwhelmed by rumors and slanders. Though the outcomes might dismay some

conservative citizens, we should accept the reality rather than crying over split milk.

It is undoubtedly certain that bo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st the dominance in the political games. They obtained few benefits at the expense of sacrific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nd calculated much on their counterparts which were viewed as inappropriate manners in general politics. They scolded their counterparts for their lack of cooperation, but it isn't to the point. We suppose that who should be blamed for the incident doesn't mean anything, but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incident is definitely matter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Brexit should remind us of concluding experiences from the high-staked political game. We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occurred for a reason. So did the Brexit. Mr. Cameron was solely a scapegoat paying for the huge damages of Britain-Europe relations.

When taking a deep insight into Brexit, we should also take the backgrounds and causes into account. Consequently you might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certainty instead of simply naming it as a coincidence. In other words, the European Union is likely to encounter more disastrous outcomes just similar to Brexit if it couldn't facilitate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Shake off blaming your counterparts for their own mistakes. Try to make self-criticism and maintain your demeanor. Only in this way could we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questions. And only in this way coul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ealize the obstacles towards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handle the issues by active and positive methods.

How to Make a Persuasive Speech Elegantly: *A Case Study of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s Speech at the 2016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如何使演讲优雅而有说服力：

浅析沙特阿拉伯外长在 2016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

LI Na

The 52nd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was held in February in 2016. Officials from many countries gave remarkable speeches and remarks at MSC, including our spokeswoman Fu Ying. One of the figures,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 Adel bin Ahmed Al-Jubeir, was particularly popular and heatedly discussed among Chinese society after our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respond to the Canadian

journalist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during his visit to Canada.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 responded to the Canadian journalist's query in regard to Daesh (ISIS) in a decent and proper manner, which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as a very logical, strategic and convincing speech.

I. Why is it convincing: Detailed Analysis of Al-Jubeir's Speech regarding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speech of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 Adel bin Ahmed Al-

** LI Na, Junior Student,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She is also a Academic director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Model United Nations.*

Jubeir, is widely acknowledged by not only the Chinese netizens but also the officials at the conference. His success in persuasion is revealed by the thundering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His charming personality and the diplomatic way to deliver the speech are what earned him the credit. Detailed analysis will be conducted to explain his success with persuasiveness and how he made his speech convincing.

1.1 The non-verbal language of the communicator matters

According to Aristotle's *On Rhetoric*,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speakers themselves are persuasive; for there are three things we trust other than logical demonstration. These are practical wisdom [phronēsis] and virtue [aretē] and good will [eunoia]."¹ Jubeir is qualified for all above.

For practical, he not only quoted the tenets of his own faith but also spontaneously gave examples of other religions, which shows his excellence in history and the erudition of situation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It is challenging for a speaker to do it well in an impromptu speech and requires sufficient knowledge reserve. With an image like this built in the audience's mind, the persuader is more likely to be convincing as an expert. What's more, he delivered the speech in fluent and well-developed English and with nearly native English pronunciation (which to some extent is on account of his overseas education background in U.S.). This has given the audienc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that the orator is not an "outsider" who is alien to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so that the audience is more likely to be opened to change.

As for virtue and kindness, as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 Al-Jubeir delivered his speech in a gentle and decent manner instead of being taken up by anger when his religious faith is distorted. This i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illustrate

that the Islamic faith is a moderate and tolerant, which serves the central point of his speech. One need not necessarily be loud and overwhelming when persuading others into their sense. Al-Jubeir neither showed anger on his face nor took a higher volume than normal speaking. When saying that "for anyone to argue that Daesh is Islamic, it's preposterous", he even lowered his voice a little bit to show sincerity when pointing out of the claim's ridicule.

"When people are of different attitudes, friendly or hostile, angry or moderate, their perspectives toward an issue can be discrepant-----not exactly different, but in terms of the degree."² The attitude that Al-Jubeir held which was delivered through his non-verbal language, not only showed his personal elegance, decency, and eloquence but also helped to achieve his purpose of persuasion more efficiently than a fierce and defensive attitude could.

1.2 The usage of rhetoric

The usage of rhetoric is crucial to persuasion----- the symbol-manipulation that produces action or attitude change in others. The Foreign Minister Al-Jubeir mainly used three kinds of rhetorical figures in his persuasion.

1.2.1 Rhetorical questions

"Rhetorical questions act as if they are questioning you and asking for your opinion so you kind of answer it in your head or as if they were putting you in their position, making you more involved with the text."³ Four rhetorical questions were raised at the opening of the speech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at every religion has perverts:

"...Don't they have a cross? Don't they do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¹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Vol.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07) pp.112]

²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Vol.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07) pp.113

³ What makes rhetorical question effective - Answers.com, http://www.answers.com/Q/What_makes_rhetorical_question_effective (accessed November 04, 2016).

*and Christ? Don't they believe that Christ compels them to lynch and kill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Can one really say that the KKK is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⁴

And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speech, another six rhetorical questions were raised:

*"What better example of compassion and mercy do you have than this?If you say it is in the scriptures, doesn't the Old Testament say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If someone does that today would you say they are Christian or they are Jewish?"*⁵

These rhetorical question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the logic and the affirmatives of the persuasion. They were delivered in a logical sequence by raising examples and citing the doctrines, which makes the speech more convincing.

1.2.2 Analogies

Stating that every religion has perverts and psychopaths by reminding the westerners that their religion is no exception is a very irrefutable ana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eech. The analogy was conducted from two aspects. In one hand, all other faiths, including Christianity, Judaism, and Buddhism, have extremists who deviate from its tenets and doctrines and interpret them distortedly. These people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cannot be called Christian or Jewish or Buddhist. I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also tenets in other religions' guidebooks that are cruel and nonsense, if interpreted superficially.

1.2.3 Parallelism

Most of the rhetorical questions quoted in 1.2.1 by Al-Jubeir accord with the rhetorical figure of parallelism as well. They considerably strengthened the logic

4 Clip of Saudi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Remarks a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2, 2016 - C-Span.org, <http://www.c-span.org/video/?c4581361/brilliant-answer-saudi-foreign-minister> (accessed November 04, 2016).

5 Ibid.

and the affirmatives of the persuasion and adorned his speech.

II. Critical Thinking: Replacement of Concept

Though the speech of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of Saudi Arabia Adel bin Ahmed Al-Jubeir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of 2016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noteworthy one, from my perspective, it is not flawless. Specifically, the latter part of his speech is on suspicion of replacement of the concept.

In the latter part of his speech, he mentioned that "The Islamic religion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was the civilization that preserved th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e and the past them on to the west" and 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would not exist without the Islamic Arab civilization." These arguments digressed a little bit from the main topic of persuasion which is to clarify that the Islamic faith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deeds of Daesh. By simply enumerat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Islamism is tolerant and is contributive to the preservation even the establishment of other civilizations; he changed the concept of "tolerant" subtly to some extent-----from the individuals' furious characteristic that may lead to terrorism and cruelty, to the inclusiveness of a civilization.

The disguised replacement of concept, like sophistr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n persuasion. It can lead the audience to a deeper conviction unless detected.

III. A Comparative Case of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Recentl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s utilized a series of tough rhetorical ques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Canadian journalist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PRC's and Canada's foreign ministers during his visit to Canada. After this event had been held on June 1st, it caused quite a stir in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pporters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powerful counterpunch after so many years of enduranc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hostile attack using the sensitive issued related to China. Chinese authority, including the officials and the spokesmen, had always held a moderate and mild attitude when faced with condemnation and accusation on particular issues like human right and democr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often blamed that they should hold tough and fierce stances in defense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o build our nation's inviolable image.

In terms of body language, the two foreign ministers have adopted totally different styles. Wang's was far more offensiv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l-Jubeir. Al-Jubeir's was almost stationary while making the persuasion. Yet, Wang used many gestures like pointing at the Canadian journalist with his fingers and the pen in his hand, as well as leaning against the podium and swinging his body position in a large angle.

In terms of the orator's attitude, Wang has adopted a much more emotional attitude compared with the moderate attitude of Al-Jubeir. To some extent, this is on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national strength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both manners can be effective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l-Jubeir was more diplomatic and proper on this occasion. "It was the 'rudest' thing he had witnessed in his 30-odd year career"⁶ commented by U.S. Seni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 Peter Rowe. It is arrogant and contemptuous to presume that the questioner was biased and ignorant of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ang could have adopted a more unflappable and decent

manner to defend his national interest, instead of seizing the floor and rebuking the journalist while she was proposing a question to someone else.

IV. Conclusion

To summarize, Al-Jubeir's success in persuasion is on account of, but not confined to, the non-verbal languages and the usage of rhetorical figures, though the speech was not flawless, as it applie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ncept to some extent. In general, the speech was a good demonstration of public speaking and persuasion regarding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which deserves not only diplomats but also student learners like us to analyze and to learn from and to appreciate.

⁶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flies off the handle on video –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www.smh.com.au/world/chinese-foreign-minister-wang-yi-flies-off-the-handle> (accessed November 04, 2016).]

少しでも中日関係の友好を進むために

浅析中日友好的进步因素

樊子贤

はじめ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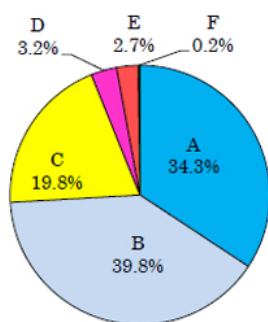
中国と日本の関係は古来非常に密接で、しばしば「一衣帯水」と形容された。両国の関係には、例えば文化や人の交流といった積極的な面もあれば、また戦争や侵略という不幸が起きたこ

ともある。この論文は近代40年間の中日外交の歴史と近年中日世論調査から中日関係をどうのようにより友好に進むのかを考察していく。

一、中日関係の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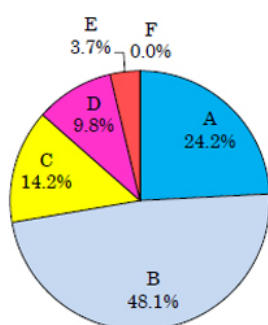
【日中関係は現在要か】

日本世論



- A 重要である
- B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重要である
- C どちらともいえない
- D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重要ではない
- E 重要ではない
- F 無回答・回答拒否

中国世論



- A 重要である
- B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重要である
- C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重要ではない
- D 重要ではない
- E 回答拒否/わからない
- F 無回答

※1. 日本側の世論調査は、全国の18歳以上の男女（高校生を除く）を対象

※2. 中国側の世論調査は、北京、上海、成都、瀋陽、西安の5都市で18歳以上の男女を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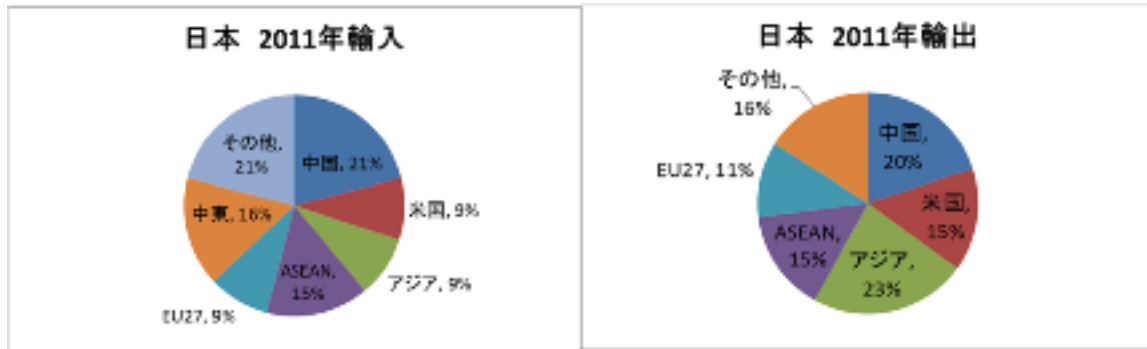
出典：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言論 NPO 「第9回中日共同世論調査」結果

* 樊子贤现就读于日本中部大学，也是珠海逐梦模拟联合国研究中心的日本专员。

中日関係を両国にとって「重要」とみる日本人、中国人はともに7割を超えており、中日関係の重要性については両国民ともに高い評価を維持し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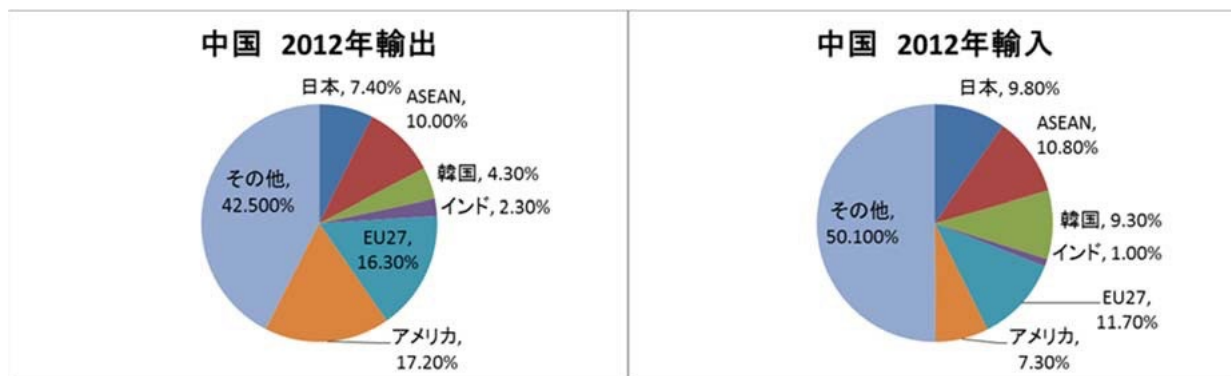
「重要である」理由については、中日ともに「隣国同士だから」が半数を超えて最

も多いが、「両国が世界第2位、3位の経済大国」であること、「経済的な相互依存関係を強め、共通利益がある」ことが続いている。



日本の貿易相手国シェア (2011 年)

出典：三菱 UFJ リサーチ & 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レアアース・ショック」に見る中日貿易の課題



中国の貿易相手国シェア (2012 年)

出典：JETRO 日本貿易復興機構 (ジェトロ) 輸入統計 (国・地域別)

上の図によると、中日貿易が互いに貿易総額において相当大的なシェアを占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011 年、日本の貿易相手国における中国のシェアは輸入が21%で輸出が20%であり、輸入輸出どちらも最大貿易相手国である。他方2012年、中国の貿易相手国における日本シェアは輸入が9.8%で輸出が7.4%である。EUやASEANのようにグループで見るとは国単体で取り上げれば、日本は輸入最大貿易相手国であり、輸出はアメリカに次ぐ第2の貿易相手国である。それで、経済面からみた場合、お互いはともに重要な関係を築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二、中日関係の友好を進むに関する

(一) 政府

■¹1972 年以降：

(1) 中日国交正常化 ▶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国交正常化。中日共同声明。「日本側は、過去において日本国が戦争を通じて中国国民に重大な損害を与えたことについての責任を痛感し、深く反省する。」

¹ 川島 真著 (東京大学)「20 世紀の、そして戦後 70 年の中日関係」

(2) 中日平和友好条約 ▶ 1978 年、中日平和友好条約。「両締約国は、前記の諸原則及び国際連合憲章の原則に基づき、相互の関係において、すべての紛争を平和的手段により解決し及び武力又は武力による威嚇に訴えないことを確認する。」

(3) 1980 年代: ▶ 1998 年

中日共同声明と平和友好条約に続く中日間の第三の重要文書として中日共同宣言が発せられ、「平和と発展の友好協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構築して地域と世界にともに貢献することがうたわれた。² 略称は**中日共同宣言**。

(4) 1990 年代 ▶ 天皇陛下下訪中 (1992 年 10 月) 「この両国の関係の永きにわたる歴史において、我が国が中国国民に対し多大の苦難を与えた不幸な一時期がありました。これは私の深く悲しみとす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戦争が終わった時、我が国民は、このような戦争を再び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の深い反省にたち、平和国家としての道を歩むことを固く決意して、国の再建に取り組みました。」

▶ 「戦後 50 年に向けて村山内閣総理大臣の談話」(1994 年 8 月 31 日) 過去と和解という二つの要素

(5) 21 世紀 ▶ 2005 年 (戦後 60 年)、いわゆる小泉談話

▶ 2005 年 9 月 3 日 胡錦濤国家主席談話

▶ 2007 年 4 月 12 日 温家宝総理国会演説「友情と協力のために」

中国の古い世代の指導者がかつて度重ねて指摘したように、あの侵略戦争の責任は、極少数の軍国主義者が負うべきであり、一般の日本国民も戦争の被害者であり、中国人民は日本国民と仲良く付き合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中略) 中日国交正常化以来、

2 高原明生・前田宏子『開発主義の時代へ 1972 - 2014 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 5』(2014 年) 岩波新書 (第 3 章 社会主義の中国的変質 1992 - 2002、執筆担当: 前田宏子)

日本政府と日本の指導者は何回も歴史問題について態度を表明し、侵略を公に認め、そして被害国に対して深い反省とお詫びを表明しました。これを、中国政府と人民は積極的に評価しています。(中略) 日本は戦後平和発展の道を選び、世界の主要な経済大国と重要な影響力を持つ国際社会の一員となりました。貴国の友好隣国として、中国人民は日本人民が引き続きこの平和発展の道を歩んでいくことを支持します。

▶ 胡錦濤国家主席は 2008 年 5 月に訪日して福田康夫総理大臣と会談し、ともに「『戦略的互惠関係』の包括的推進に関する中日共同声明」を発表した。

■ 将来:³

1、双方は両国の国民感情を心を込めて維持し、前向きな方向に導き、これを良い方向に発展させる責任があるだろう。双方、特に両国の政治家は大局に着目し、正しい行動を取り、両国の国民感情の対立面がエスカレートしていくという悪循環を根本的に断ち切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⁴

2、中国は日本人に対して留学生の援助が少ない。日本は中国人に対して留学の援助はしますが、卒業後の就職支援がない。もっと留学生を大事にし、交流とフォローアップを強化すべきだと思う。留学生を友好のかけ橋として両国の理解を深め、親密な関係を築いていくべきだ。

(二) マスコミ

株式会社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研究員関志雄がそう述べた。⁵ 「2001 年、中国脅威論が猛威をふるっていた時期に、多くの新聞社からコメントを求められ、私は『中日の経済格差はまだ大きく、中日は競争関係ではなく、補完関係にある』と述べたのですが、このようなコメントは当時の世

3 刘江永 (人民大学) 『中日关系二十讲』(2007 年)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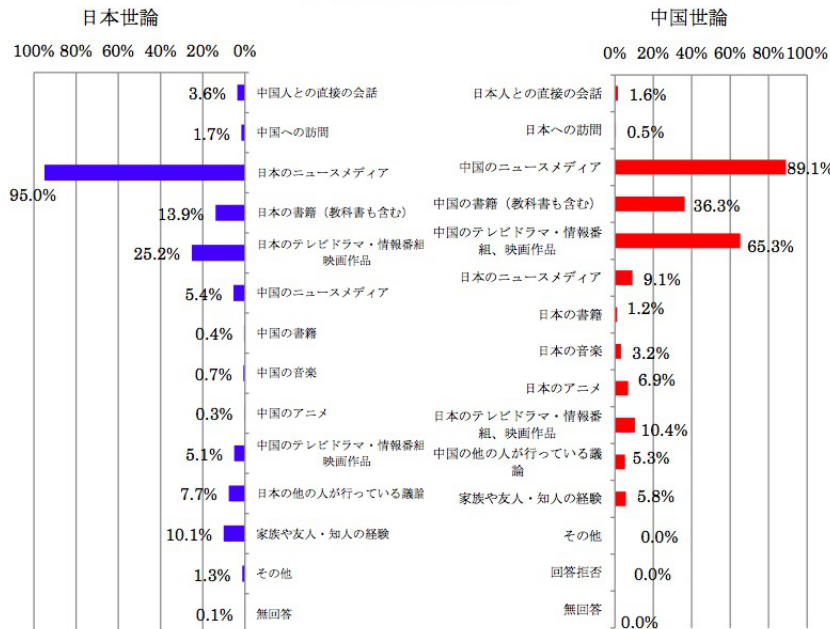
4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 1972-2012 政治』(2012 年) 東京大学出版会 (第 15 章 戦略的互惠関係の模索と東シナ海問題 2006—2008、執筆担当: 阿南友亮)

5 関志雄上席・津上俊哉上席著 「中日関係に欠けるものとは」(2002 年)

の中の空気にあわなかったせいか、ほとんど掲載されませんでした」記者も書きたくて書い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だが、自分の記事を載せてもらうために悪いことばかり

書く。とりあえず、このような悪循環からマスコミは脱出すべきだと思う。

【相手国に関する情報源】



(三) 民間交流



日本では約6割、中国では約7割の国民が民間レベルでの交流は「重要」と考えている。民間レベルの交流が「重要」と回答した人に理由について尋ねたところ、日本人は「相互理解の増進」との回答が、中国人は「共通利益を拡大するための基盤」との回答が多い。

1500年以上にも及ぶ中日関係史を振り返ってみても、遣唐使や鑑真の時代も含

めて、民間交流主体の今の方が本来の中日関係の姿なのだとも言える。両国の政府同士を中心に盛り上がった1980年代が特殊だったのである。

今後どのようなことが中日関係の改善を意味するのか？ある人は「政府同士の良好な関係を基盤に両国の国民が互いの国や文化を尊重し合うこと」と言うかもしれない。その前政府の改善方法をもう述べ

たが、この言葉のうち「政府同士の良好な関係を基盤に」という 1980 年代式の関係が復活しうるかは私たちが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それよりも、政府同士の関係の如何を問わず民間交流が活発になっていくことがあるべき姿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る。その際に大切なのが「両国の国民が互いの国や文化を尊重し合うこと」であろう。

両国国民は中日関係の未来に自信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世界は矛盾に満ちており、世界の前進及び発展の促進は、すなわち挑戦的状況を転換し、矛盾を解決するプロセスであり、中日関係も例外ではない。私は、中日友好関係を発展させることが、中日両国の基本的かつ長期的利益に合致し、両国の絶対多数の国民の希望にかなうものであると、ずっと信じている。現在、両国関係は敵対する戦争状態からはほど遠く、国交正常化前の状況と本質的に異なる。中日は友好国であり、両国は 1998 年に平和と発展のための友好協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関係の樹立を宣言し、たくさんの中国人は日本を自分の友人でありパートナー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従って、両国国民は中日友好の生命力を疑う理由は何もないだろう。

GMO チャイナコンシェルジュ株式会社の大西正也氏によると、「戦争をなくす唯一の方法は世界中の人々が世界中に友人を作ること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この考えは中日関係にも同じことが言える。今後の中日関係が良くなるかどうか、長期的に見た場合、国民がお互いに信頼関係を築く以外に方法はないだろう。

おわりに:

私が高校時代から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た。その時から日本人、日本文化を接してきたと、小さい頃マスコミから知った日本人と本当の日本人が違っていることを気付いた。人と人の交流は心の交流だと思う。そのような人間的な交流からこそ、本当の外国の姿がわか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私は自分で見た日本の姿と知り合った日本人の様子をぜひ周りの中国人に伝えたいと思う。

中日関係が友好に進むのは、きっと我々両国国民の言動にかかっている。もちろん、直接に相手国へ行く交流する力が非常に大きい。実は、あるメディアの力も大きいと思う。それは SNS だ。先日、インテリジェンス中国 (英創人材) 総経理の金鋭氏がある SNS に「多くの中国人が日本人のことが大好きだと言っていた」とあるエピソードを基に書き込んでいた。そこには多くの日本人、中国人から「いつの日か中日の経済とか文化がもっと自由に交流できたらいい」「市民レベルで理解し合うことも大切かもね」などと多くのコメントが寄せられ、そしてシェアされていた。このような記事は小さな一歩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沢山の人が理解を示しあうことができれば、それはとてつもない力になる。つまり、みんなの力こそ中日関係を友好に進むために一番大切なものだ。中日関係を改善する術を模索していた私が、この論文を通して 1 人でも多くの人がそのことに気づいてくれ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

日本における模擬国連活動の現状

日本模联发展现状调查

孙益民

1980年代、日本においては一部の学生や学者の間でしか知られていなかった模擬国連だが、2016年現在では、その活動は日本全国に広まっている。

2010年に成立したJMUN（日本模擬国連）という組織が、今の日本における模擬国連活動を統括している。組織は完全に学生による運営する。組織の関東と関西二つの事務局の傘下には、7つの研究会と2つの支部が存在している。全国で700人以上の大学生が日々模擬国連活動に取り組んでいる。会員の主な所属大学は、東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一橋大学、東京外国語大学、金沢大学、神戸大学、慶應義塾大学、早稲田大学、上智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館アジア太平洋大学（APU）、北九州市立大学などある。国際系や法・政治学系の学部に通う学生だけではなく、経済学部や文学部、はたまた理学部や工学部など理系の学生も多数所属している。

JMUNが主催する事業と大会は全米大会日本大使団派遣事業、全日本大会、関西大会、北陸大会と九州サマーセッションである。ここで全米大会日本大使団派遣事業

（全米団）と全日本大会（AJMUN）を紹介する。

全米大会日本大使団派遣事業（全米団）とは毎年ニューヨークにおいて開催される模擬国連会議全米大会（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に日本からの代表団を送る事業である。実は日本における最初の模擬国連団体は、1983年、当時上智大学の教授を務めていた緒方貞子氏（元国連難民高等弁務官）を中心に、模擬国連会議全米大会への派遣を目的として組織された。選考についての詳細は<http://nmun-jpn.jimdo.com/>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この事業はJMUNの最も大切な事業と言ってもよい。

全日本大会（模擬国連会議全日本大会）とは毎年年末に東京で開催される模擬国連大会である。全日本大会は、毎年、全国から約300名の参加者を募り、2つの英語会議を含む7つの議題に分かれて会議を行う国内最大規模を誇る模擬国連大会である。今年の12月26日から29日まで第28回の大会が行われる予定だ。議題は下記の通り。

| 日本語会議 | |
|---------------------------------------------------------------------|-------------------------------------------------------------------------------------------------------------------------------------------------------------------------------------------------------------------------------------------|
| 非承認国家 | Unrecognized States |
| NPT 再検討会議 | 2015 Review Conference of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
| 宇宙活動に関する国際行動規範 |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Outer Space Activities |
| ヨーロッパ危機への対策 | The Measures to European crisis |
| 平和および国際理解の強化ならびに戦争宣言人種差別主義およびアパルトヘイトとの戦いにおけるマスメディアの貢献を律する基本原則に関する宣言 |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ass media to strengthening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o countering racialism, apartheid and incitement to war |

| 英語会議 | |
|--------------------------------------------------------------------------|------------------------|
| Combating intolerance and violent extremism based on religion and belief | 宗教・信条に基づく不寛容及び過激主義への対応 |
|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 移住労働者の人権保護 |

近年、日本全国各地で発足した模擬国連団体について、日本模擬国連（JMUN）は、会議設計や組織運営のノウハウの提供を通して、新規団体設立の支援に取り組んでいる。

これまで主に大学を中心にしてきた模擬国連は、近年大学だけでなく、高校でも授業の一環で「模擬国連」が取り上げられるケースが増えている。2007年に米国国連協会の主催により開催される高校模擬国連国際大会への日本代表団派遣事業を皮切りに、同年にはグローバル・クラスルーム日本委員会の主催のもと全日本高校模擬国連大会が開催された。今年は10回目となる。また、模擬国連の教育的有用性は広く認識され、授業や部活動で模擬国連に取り組む高校が年々増えている。

本文を通して、大学、高校を問わず、

日本には全国の模擬国連活動を統括する組織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ほとんどの主要会議が一つの組織によって主催することはいったいよいのか悪いのか。その中の苦楽は運営者しかわからないものである。

参考：

日本模擬国連 HP: <http://jmun.org/>

グローバル・クラスルーム日本委員会
HP: <http://jcgcc.accu.or.jp/>

* 孙益民是外交学院外语系日语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也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会务部干事。

Introduction to BMUN

Beijing Model United Na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model UN activities in China hosted by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directe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China,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 China and China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entral Committee. It is held each year by a student-run organization on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campus called CFAUMUNA, and is recognized as the flagship conference in China.



The yearly Beijing Model United Nations attracts over 300 delegates from 38 top universities and 20 high school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as well as student delegates from Russia and Indonesia to attend the meetings. Delegates in previous BMUNs have been engaged in discussions with each other and handled different issues mainl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



BMUN has developed into a premier stage for those students having passion for diplomacy and spirits of exploration. Its high-level standard derives from rigorous academic preparation. Bearing in mind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work as the top priority", the academic preparation of each year's conference lasts six to seven months, which includes thorough research of the topics, composition of study guides, rule setting, and arrangement of the Dais' work

during the conference. Every member of the Department of Academics makes full and careful preparation, including offering research guidance and help to delegates before the conference, guiding delegat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during the conference, and making sure the topics are fully and thoroughly discussed.

BMUN also serves as an appropriate place for fostering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Conferences are usually arranged in a tight schedule. It is a stage for exchanges of ideas or even competition between delegates on their articulation and eloquence, and thus enhancing understandings among them. Every year we prepare an exciting Social Event for delegates so that they can forget about the nervousness and tiredness during the sessions and show their versatile personality. We hope that our meeting could bring delegates excitement and joy.

Beijing Model United Nations 2016 (BMUN2016) will bring the delegates to a world of complexity which requires aspiration and wisdom to manage. Delegates who present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in CFAUMUN this time will be invited to go to BMUN2016 and this will be the only access for CFAU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BMUN.

With much anticipation for a conference with fruitful result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proactive performance.



特别感谢所有参加杂志投稿、制作的作者和编辑人员
本刊为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内部刊物，立场中立，所有文章仅为作者态度，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投稿及一般性问题咨询，请联系 frontier@cfaumun.org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荣誉出品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